

江的对岸，远山朦朦胧胧。薄薄的雾气在夕阳的照耀下，沿着岸边青山，弥漫出一条白色光带。一艘游艇在远处的水面快速滑动，到了近处，拐一个弯，拖出两条波光粼粼的绸缎。优美的曲线所经之处，江水荡漾，云朵、山峦就在水中晃动。记忆中斑驳的碎片，随着这样的晃动，瞬间光亮如昨。

母亲年轻时是个搬运工人，工作地点就在这条江边小路。她常常早出晚归，回来时带着满身灰尘与汗水。这里，曾经洒落过搬运工辛劳的汗水，也嵌印着他们匆忙的脚步。以前家乡与外地之间的贸易，都通过水路运输进行，所以码头边上的搬运工人——一群具有时代印记的身影，自小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。

江边小路是泥土路，陡峭，坑洼。搬运工们戴起草帽与口罩，挥着汗水，拉起装满一包包水泥的板车，从坡顶就往坡尾冲。车轮飞奔，脚步与车轮竞跑，而小路没有围栏，如果方向没控制好，极有可能从边坡掉下去，冲入江水中。一个个疾驰的身影，鸣笛的货轮，堆满货物的码头，流动的江水，成为这条路上独有的风景。

下小雨时，搬运站给每个工人发一块油毡布用以遮盖水泥。在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泞路中，母亲常常满身泥浆地把水泥拉到码头边。年轻时的母亲看上去很伟岸，但其实她拖着板车在下坡时总是胆颤心惊，生怕一不小心就掉入树丛或江水中。就这样，烈日与草帽，风雨与斗笠，四季常与母亲相随。

小路上以前有个涵洞，夜晚常有流浪汉在此歇息。女工们晚上下班经过时，流浪汉常常会追赶她

旧时花

梁冬霓



对影 周文静 摄

们。后来，已完工的男同事，都会等到女同事完工后，一起经过那个涵洞，再各自回家。路上，母亲的单车轮一定是匆忙的，即使有星光满天，她也无暇欣赏，她的心里另外有一个星空，那就是她的孩子盼她归来的眼睛。

除了到水泥厂搬运水泥，港务所里的活也是由搬运工人来承担。大卡车在乡村里搜集的柴碳、松香等货物，一担担、一桶桶地被他们卸下来，再由码头边上的吊杆吊到船上。从外地运过来的化肥、农药、牛皮袋等货物，也用吊杆从船上吊到码头，再由搬运工人搬到指定地点。停电时，吊杆停止运作，搬运工人就只

能使出全身蛮力，把这些重物扛在肩上，小心翼翼挪动着脚步，踏上岸与船之间的一块木板，再踩实脚步，一步步从码头扛上来。

因体制改革，搬运站解散了。水路沉寂，陆运发达，搬运工拉板车的身影，扛重物的身影，热火朝天的汗水，使力气时的吆喝呼喊，都停留在20世纪末小镇里的码头上。那些场景像是一个时代的蓝本，封存在搬运工人的记忆中。买断工龄的搬运工得到一笔补偿款之后，开始新的工作历程，没有领取补偿款的搬运工，则抱紧苦尽甘来的希望，在其他行业中熬到退休年龄，终于等到政府每个月发放的养

老保障。

如今，这条曾经尘土飞扬的小路，已铺成水泥路。江边有人钓鱼，有人散步，每到傍晚，总有人三三两两从这里走过，看天上的晚霞，听江水的吟唱。一个小石墩上写着“圳头渡”，那是一个废弃的小码头。级级石阶已被草丛覆盖，我拨开两边荒草，从石阶走下去，望着对岸的圳头，想起以往繁忙摆渡的船只，不禁感慨时代已经转身。江水在我眼里仿佛愈加清澈，记忆也越来越清晰，艰辛不应被遗忘，正如眼前的生活应该被珍惜。

坡顶的地名叫甘露亭。甘露亭是个古亭，连着顺贤庵，自古以来是长途跋涉之人的歇息点，可以遮风避雨，可以饱览风光。

飞檐翘角的甘露亭已重修，朱红色外墙刻着一副对联：甘饴天下，露润万方。明清时代开始，那些下南洋的人，或是从南洋归来风尘仆仆的人，都要来此停歇。也许是想借得一滴甘露藏于心间，也许是想祈祷一丝祝福远走他乡，这里，总有满怀希望的人，也有伤心失意的人。

这也是搬运工拉着板车必经的地点。但忙于生计的搬运工人，多是步履匆匆，难有赏景之心。从坡顶往下奔跑时，大概只是向甘露亭祈祷一份平安，以求不出现任何意外。

夕阳下的火烧云像浅红的、橘黄的绸带，飘浮在空中，尾部的小云朵如丝丝轻纱，随意而散漫。天空是斑斓的，映照着波澜不惊的江面。母亲的白发轻轻飘动，她的心里也早已波澜不惊。她站在这里，就如同一座甘露亭，望着江水的澎湃与平静，深谙人世的艰难与幸福。

BP机

曾经有一个BP机，刚配那阵儿，整天盼着有人呼，见到熟人就留号，尤其是女士，有点显摆的意思。

云是我原单位的同事，娇小可爱，秀色可餐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的关系比较暧昧，好事者就议论纷纷。后来，我到S城工作，就很少联系了。一天，我乘坐故乡返城的客车，刚一上车，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我，一看，是云。她的身旁有一个空位。这真是天赐良机，虽然她不到城里，半路下车，但我仍将这视作一次浪漫之旅。

不觉，云到站，她向我“拜拜”。我急忙找出一张纸片，刷刷写下一行数字给她：到S城来，呼我！她微笑着接过纸片。但半年过去，并无消息。



一日下班，我正骑车回住所的路上，别在腰间的机子忽然响了，摘下一看，没乐过去：“我在中兴大厦门口，穿红色衣服，左手拿一张报纸，右手持一杯可乐，方便请来。云。”

旧时光

程远

将自行车停下，换乘的士，不久就见一红衣少女长发飘飘，迎风而立。

云说，没赶上回去的车，今晚得住在城里。又说，我男朋友一会就从商场出来，我们是来买结婚用品的。又又说，大喜的日子定下后再呼我，要我回去喝喜酒。

我像接待领导一样，帮他们拎东西请吃饭找旅店，花去我大半月的工资。

后来，我把BP机送人了。

人在707

1998年7月3日，与陈焱、李凌恒回老家红透山玩。凌恒是报社摄影记者，带了相机。老家朋友六子、张斌陪我们在红坑口大竖井乘着罐笼下到707（米）中段，这个中段虽不是当时最深的地方，但也很深了。是一个采矿场。井下，我自然是不陌生的——1986年技校毕业，我被分配到红坑口八楼开卷扬机，这是矿山八大技术工种之一，也就是说，谁要是干上这个工种就很难改变——矿山培养你不容易，师傅们很多都是干了十几二十年，甚至一辈子。我当然不想在这里干一辈子，就要求改变工种，宁可下井去当一线工人，以便日后跳槽。

当然这是后话了。

总之，我对井下工作环境还是比较熟悉的，不像陈李二位那般感到新奇。

陈焱后来写了篇报道《人在707》，配了李恒拍的照片，发在某期的《中华第三产业报·老百姓周刊》上，反响不错，至今我还留有剪报。

矿山两日，得到了我当年朋友们的盛情款待。除了红坑口，我们一行也参观了其它矿区主要单位，比如选矿厂、冶炼厂、机械厂、两办楼，当然也喝了无数的酒。

1999年五一劳动节，我又邀请陈东浩来老家矿山一次，时在抚顺洗化厂的郭红也一并返乡，除参观矿山外，我们还去看了浑河。东浩生于丹东，长于上海，在我的朋友中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记得当时，他望了望河对岸的山野，煞有介事地说：此地定有大人物出现。

郭红问：不会是程远吧？

东浩说：他算啥，应该有帝王啊！我说：那东边五十公里处是满族发祥地兴京，努尔哈赤的故乡。

东浩颌首微笑，大师样地举手摸了下巴。

后来知道，东浩来之前是做了功课的。

听讲座

1998年11月21日，与陈焱去中国医科大学学术报告厅，听辽宁爱书人俱乐部组织的葛兆光先生讲座：“妖道与妖术——小说、历史和现实中的道教批判”。翻看零星日记，有如下记述：

葛先生说：随笔也罢，杂文也罢，书评也罢，时论也罢，它能否是古代溅水考槃的回声么？它能充当上苍的木铎么？

所谓的传统文化，即是由历代精英所总结和创造的，它代表一定的（当时的）国家制度、官方思想（意愿）及政治背景，可以说是随着某个集团（政治统治者）的意愿而转移的，并不一定是真正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，也就是说不一定能够代表民众，代表社会大多数。这从正统的文化遗产中（特别是史书）可以看出。但真正的历史，应该是人民写的。所以说民间流传下来的“东西”往往更为真实可信，虽然小说、故事、传说中更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，但它定有其渊源。

近年来中国学术界讨论异常激烈且愈加引起重视的问题就是：面向大众，面向民间。

1999年7月30日，与陈焱又听过一次李辉的讲座，并当场买下他的一套文集：《沧桑看云》《文坛悲歌》《风雨人生》《往事苍老》《枯季思絮》。那时工资好像也就七八百块，这套书一百多元。不过，李辉先生是我敬重的学者型作家，当时是，现在也是。